

劉
豁
軒
著

報
學
論
叢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從民國十七年到現在，前後辦了九年報，教了九年書；結果是毫無成就。居常默念：人生最應有爲的一段，就這樣消逝了嗎？未來的歲月又將如何？

在燕大的時候，就想寫一本書，討論報學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新聞的確實」。五年前的今天，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大被日寇強佔，我同幾位同事被捕入獄；平日搜集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因此蕩然無存。近兩年，常想就記憶力之所能及，勉強寫成，而迄今尚未動筆。

這本書裏的幾篇東西，是我在教書時期「應徵」「應邀」不得已而爲之的產品，根本不值得浪費紙墨。可是爲了便於青年同學參考，並藉以警惕自己，策勵自己，覺得也不妨編印出來。

裏面有幾篇文章，如「明日的中國報紙」，「報紙與罪惡新聞」，「公意投票」，「此次國難的宣傳」，「燕大的報學教育」等，原來都附有註解及參考書目。此次爲了便於排印，完全取銷了「幾篇講演，是幾位燕大及中大同學紀錄，經我整理的。」「燕大學生公意投票」及「燕大的報學教育」兩篇，是我同張君景明合作的。「怎麼樣看報」，是王君愷增由英文翻譯過來的。本書排印時，劉君讓之協助校正。統在此致謝。

目

錄

明日的中國報紙	一
報紙與罪惡新聞	一〇一
中國報業的演變及其問題	一五二
報紙的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	二一三
報紙與社會服務	三二三
戰爭時期的報紙	三七四
此次歐戰的宣傳	四三五
怎麼樣看報	五一五
公意投票	六〇六
燕大學生公意投票	六四七
燕大的報學教育	八〇一

明日的中國報紙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在北平中國大學講演

在討論本題之先，有幾點要略加解釋：第一，我所說的報紙，是指自由的，職業的報紙；政府的統制的報紙不在討論之列。第二，我用「明日」兩個字而不用「將來」；因為「將來」含着演變的，消極的意義；「明日」則含有不滿意現狀，期待着由黑暗躍入光明的積極的感情在內。第三，我不是要作預言，而是要根據中國報紙過去演變的歷程，參酌報紙進步國家的實際情形，對於明日的中國報紙作一個概括的推斷。第四，任何社會組織都有牠決定的因素。報紙，除了牠的主觀的問題之外，還有些客觀事實；這些客觀事實，對於明日的中國報紙的決定性，有更強大的力量。換言之，要談明日的中國報紙，必先推斷明日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可能的情勢。明日的中國在這幾方面將呈現什麼姿態呢？我們只能根據過去和現在，作比較可能的假定。

(一)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本題。

開頭先要作一個基本的，樂觀的假定：假定明日的中國是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所謂現代的民主國家，就是說內部和平統一，對外獨立自主；而政治制度則是民主的。民國以來的中國，嚴格的講，既未和平統一，又非獨立自主；政治制度則始終不是真正民主的。這種客觀環境，是凡百事業前進的阻力；當然更是中國報紙未能正常發展的主要原因。四分五裂，連年內戰的結果，只能有以軍閥官僚為背景的報紙；自由的職業的報紙，不只發展極度困難，且隨時有被摧殘的危險。至淪陷於次殖民地狀態的國家，整個宣傳機構，直接或間接在外人控制之下，根本不允許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存在。其次，報紙與政治制度也有密切的關係。自由的職業的報紙與民主政治是同時產生的雙胞弟兄；牠們是互相為用，互相依賴的。沒有自由的職業的報紙，民主政治不能運用；沒有民主政治，自由的職業的報紙沒有存在的可能。從前的專制政府，行的是愚民政策，根本不需要報紙。近代的獨裁政治，「報紙只是政府才能彈的鋼琴」。民主政治，也叫「公意政治」。國家的立法，是人民公意的表現。人民參與國家立法的方法，雖然在制度方面有選舉，議會，政黨，創制，複決，罷免等方式；然而最靈活最敏捷的方法莫過於報紙。其次，實行「公意政治」，必須先使民衆能正確的，迅速的知道政治及社會各方面的實際情形；然後公意的表達才有根據，才能正確，才能對國家立法有貢獻。這當然非賴報紙的力量不可。西洋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現代報紙發榮滋長，突飛猛晉；主要的原因是民主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許多國家之內，民主政治陷於危機，自由的職業的報紙

也隨着窮途沒落。中國今後的政治制度假如是獨裁的，則報紙的問題根本不必討論。依現在國內外情勢觀察，我們可以推斷，今後中國政治，雖然不能說立時就可以成為民主的，至少要向着民主方面發展。民主政治，一定要把報紙自由列為人民基本權利之一，明定於國家根本大法之內。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在法律上得到了安全的保障。所謂報紙自由，就是說，在和平時期，人人都有權利辦報，人人都可以作報人，人人都可以把他信以為真的意見藉報紙發表出來。既不要登記，也不許檢查。任何限制報紙自由的法規都不應有；就是「出版法」，也是同「報紙自由」不並存的。必得這樣，報紙才有存在的價值，才能盡牠的使命。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自由的職業的報紙一定會發揚光大。我們自然期待着這種境界的來臨。

報紙自由不是絕對的，牠包含着法律的與道德的責任。所謂法律責任，是報紙刊登侮辱個人或團體名譽的記載，要受法律的制裁。這在西洋叫「誹謗法」。在美國，誹謗法又分「民事誹謗」和「刑事誹謗」。民事誹謗是指個人受損害，刑事誹謗是指社會或國家受損害。中國雖沒有有系統的誹謗法規，但在民法裏也有這類條文。報紙自由要受這種法律的限制。這不只同報紙自由的原則毫無觸碰；而且是極合乎民主精神的。所謂道德責任，是報紙刊載任何文字或圖畫，必須是對國家社會有益的。這在表面看像是無關宏旨的簡單問題，實際却是極重要而且很複雜的；因為牽涉範圍既廣，影響又特別大；同時標準又極難確定。過去一個多世紀，在西洋現代報紙演變過程中，這是一個中心問題。除了依賴報人自身的努力之外，還沒有完善的解決辦法。明日的中國報紙的發展，有賴於現代的民主政治；同時更有賴於能善用報紙自由的報人。政治非民主，中國報紙自然不會有明日。沒有真能瞭解報紙自由的報人，中國報紙也不會有明日。

此外還有一點，將來也要成問題的。民主政治有一個傳統，就是政府不只不統制報紙，而且不染指於報業。就連政黨，無論在朝在野，多數少數，也很少正式公開辦「機關報」的。俾斯麥是近代第一個善於利用報紙的政治家，他也只能用間接的方法，暗地裏控制幾個所謂「爬行報紙」。英、美、法以及九一八以前的日本，甚至民國初年的中國，沒有一個政府辦過報紙，通訊社，電影，劇院以及廣播無線電台。在民主國家之內，報業及其他宣傳事業，是人民獨享的權利。還記得，一九三九年歐洲正鬧着所謂「莫尼克危機」的時候，英國政府見於德國海外宣傳的可怕，以六千鎊的代價，補助路透社有限公司，每天向海外增發兩千字的電報，以與德國的D.N.B.對抗；結果引起了議會對政府的責備與論辯。路透社的負責人雖然一再說明不因此失去獨立的立場，政府一再的解釋說這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也擋不住議會的反對。第一次歐戰的時候，英美兩國政府為了戰爭的勝利，均曾致力於宣傳工作。英國最初的威靈頓大廈，其後的情報部，美國的情報局，對聯事都會有過很大的貢獻。可是戰事一旦停止，這種組織立時就宣告撤銷。原因是：（一）報紙是一種企業，企業以民營為原則，政府不應該與民相爭。（二）在民主政治之下，報紙的主要功用是反映輿論。輿論是「民意」，不是「官意」。輿論自然也可以擁護政府，而主要的作用還是監督政府。（三）政府染指於報業就等於統制報業，也就等於限制，甚至威脅人民的言論出

版的自由。現代報業需要資本，資本越大力量也就越強。政府以國庫爲報紙的經濟後盾，還有誰可以同牠競爭？結果勢必至變輿論爲「官論」。這就如同政府在台上演劇，同時又在台下喝采。也可以說政府用間接的方法「防民之口」一樣。就政治制度說，這是反民主的；就報業本身說，這是不公道的。獨裁政治把報紙收歸「國營」，最爲民主政治所詬病。因爲這種的控制，實際就是欺騙，其害無窮。中國自從民國十七年以來，掌握政權的國民黨所辦的報紙及通訊事業規模日大，勢力日增。民營報業已經感受到相當的威脅。中央通訊社的發展，對中國報業雖然不無助力；可是國民黨用牠控制了全國的報紙，同時使民營通訊事業沒有發展的機會。假如中國將來要走上民主之途，這也是一個應該注意的問題。實際，一個政黨或是一個政府，如果牠的施政是真正爲國爲民的，不愁沒有民間純正輿論的擁護。這種的擁護，纔更有力量，更有價值。否則，任憑用什麼方法統制報紙，也沒有用處；終必有「川湧而潰」的一天。

(二)

第二。假定明日的中國努力於物質建設。因爲機器的發明，生產方法的改變，現代凡百事業都要企業化。所謂企業化，就是用大量的資本、科學的組織、機器的運用，以求大量的生產。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在物質文明先進國家，早已踏上了企業之途。在若干國家，報業且已列於「大企業」之林。這是西洋工業革命以後自然的結果。所謂報紙的現代化，就是企業化。企業化是報紙發展必經之路。現代的機器文明，有三種同報業有關係：一，交通；如火車，輪船，飛機。二，通信；如電報，電話，無線電，無線電傳影。三，各種印刷造紙機器。這種機器的發明和應用，促成了現代報紙的誕生與發展；同時也促使報業變成了企業。例如交通：美國在一八四零年全國鐵路共爲九千英里，那年全國報紙的數目是一千六百多種。到一九零零年鐵路增至十九萬英里，報紙則增到兩萬一千多種。報紙的發達同交通工具的進步成正比例。交通如此；印刷造紙和通信的機械化，對報紙也有同樣的影響。近代的機器文明，不只對報業有這樣直接的關係；牠還造成了支持報紙企業化的經濟環境。一般生產的機器化，企業化的結果；是工商業發達，人民物質生活提高，人類社會關係密切；這不只產生了社會對報紙的需要，而且加強了社會對報紙的經濟支持力。在機械化，企業化的物質環境之內，當然的，也是必然的，產生機械化和企業化的報紙。

中國的物質文明，比較西洋起碼落後一個世紀。尤其因爲連年的外侮與內亂，過去四十年的虛度最令人痛心。假定我們從戰事結束以後就舉步向前，我們的時代也只等於西洋十九世紀中葉。一切落後，報紙當然不會跑到前面。據有人估計，事變以前全國報紙的總銷數，每日最多不過二百萬份。這只等於英、美、法、德、蘇、日等國一個大報的銷數。這個渺小的數字，也就可以代表中國報業組織與設備的簡陋；同時也說明，中國報業還在徘徊於企業化的前期。戰爭結束以後，中國爲求永久的生存，必須積極的走上現代化之途。必要飛快的追蹤四洋，努力於物質建設。用現代的方法和工具，開發富源，發展交通，振興工商業。一般的事業現代化，報紙也就隨著現

代化，這是可以斷言的。

報紙的企業化，自然是進步的現象。第一，新聞來源可以展開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利用新的傳信工具到至高的程度，全人類的動靜，都可以隨時收入新聞記者的鏡頭。第二，新聞傳遞迅速正確。電報電話比較驢馬鴿子傳遞消息迅速；全部應用電報電話，又比部分的應用迅速。將來無線電傳影發達以後，傳訊不只更迅速，而且更正確。第三，新式的交通工具增加報紙傳遞的速度。汽車比自行車快，飛機又比火車快。第四，報紙企業化，印刷材料可以大量生產，報紙也可以大量生產。這樣，報紙的成本當然減低；利潤也就優厚，同時又處於經濟支持力強的環境之內，業務發展的機會自然很多。報業到了這個階段，假如善於經營，真是可以賺大錢的。第五，報紙企業化，組織必須科學化；組織科學化，工作效率當然增加，人力物力兩都經濟。第六，報業機器化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把作報的時間延長，印報的時間縮短。新聞記者最大的威脅是時間，他要隨時同時間鬥爭。美國人稱報紙編輯最後的時限爲「死線」，可見作報所受時間限制的嚴格。報紙的內容要豐富精彩，作報的時間必須從容。從新聞採訪，傳遞，以至編輯所能運用的時間越長，報紙內容越能精彩。假使出報的時間是早晨六點，任何地方在五點鐘以前所發生的新聞都能登在報上而不悞六點鐘出報，那是最理想了。出報的時間是「死」的。一晝夜只有二十四小時。把這二十四小時分配在作報同印報上面；印報的時間長，作報的時間就短；作報的時間短，報就不會作好。反之，印報的時間短，作報的時間便長；報紙內容便會好的多。怎麼樣可以把作報的時間延長，印報的時間縮短呢？只有在印刷工具上想辦法。生產迅速的印刷工具，便是進步的印刷工具。輪轉的轉筒機勝過手搖的平版機，主要原因是前者印得快，前者節省印報的時間，而延長作報的時間。這是報紙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其關係非常重大。

可是，報紙的企業化也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報紙的企業化也就是資本化。企業化的報業，需要大量的資本。拿美國的例子來說：當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報紙還在企業化的前期，辦一個報也不過用幾千美元。葛瑞萊的紐約講壇報，在一八四一年創刊的時候，只用了二千美元。就是奧克司在一八九一年接辦紐約時報，他的資本也不過是七萬五千美元。現在美國隨便一個報的資產也要在幾百萬以上。芝加哥每日新聞前些年出盤，賣了一千三百萬。費城檢閱報賣了一千五百萬。那就是說，現時在美國要辦一個同這兩個相彷彿的報，起碼要一千幾百萬的資本。這兩個報在美國也不過是中等以下的報。要想辦一個如紐約宣告講壇報或紐約時報那樣規模的，勢非幾億圓以上的資本不可。爲什麼要用這樣大的資本呢？一大半是用在新式的機器設備上。所以企化業的結果，非有大量的資本不能辦報。報業本是「思想的職業」；可是報業發展到這個階段，這種職業便受了嚴重的物質條件的限制。任憑你有甚麼理想，主義，原則，沒有資本，固然要臭在肚子裏；就是資本小也不易宣達出去。反之，你如果有資本，大量的資本；就是邪說異端，也能够傳布到社會上。此其一。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一切的事業，資本越大越容易發展；越容易發展，越要謀求更大的發展。這樣，一國的報紙，很容易被少數資本家控制。美國現在有六十幾個「報系」，包括三百六七十個報；控制着全國報紙總銷數的百分之四十。在民主國家之內，這當然是不

公平的，也是很危險的。此其二。報業既需要大量的資本，在經營方面，一定要謀求利潤。把報紙看成貨物，辦報便成了生財致富的手段。要投資的利潤大，必須貨物銷的多，因此便不能不迎合讀者的心理。讀者喜歡看什麼，便登什麼；喜歡知道什麼，便報告什麼；願意聽什麼，便講什麼。甚麼原則，理想，政策便都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了。這又違反了報紙原有的使命。話這樣講自然不免失之於極端；但是至少在邏輯上是如此。而且嚴格的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法，戰前的日，德，等國報紙演變的歷史，程度雖有不同，傾向無不如是。像華倫的「觀察者」，美國的「基督科學箴言報」，華雷岡的「羅馬觀察報」，只顧原則，不計利潤的，實在太不見了。此其三。這都是報紙企業化以後可能發生的結果。今後中國報業勢必要向企業化方面發展。七七事變以前，上面所分析的種種現象，已經顯露了端倪。我們現在應該借鏡於走在我們前面的各國報業的情形，對於這個問題早作考慮，早作準備。

(三)

假定明日的中國努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報紙需要讀者，現代報紙需要更多的讀者。中國全人口號稱四億五千萬。事變以前，全國報紙的總銷數不過二百萬份。美國全人口是一億二千三百萬。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美國全國報紙日銷四千二百萬份。核計起來，中國每二百二十五個人看一份報，美國三個人看一份報。這兩個數字相差太遠了。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自然也有經濟的和政治的；然而主要的還是由於中國文化教育的落後。中國辦新式教育已經半個多世紀。高等教育比較西洋自然差得很遠；平民教育的提倡，也未見有什麼效果。又因為物質生活的壓迫，少數識字的人同時有讀報能力者，當然為數很小。事變以後，情形又自不同。一般人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比較以前增強；同時社會生活又在激烈動盪之中，對於時事的注意，自然今非昔比。雖然沒有統計數字，但我們可以想像，事變以後，全國報紙的銷數一定增加了很多。將來戰事結束，人民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當然還能保持，或者更要加強。假使將來施行民主政治，努力物質建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更加密切，更可以增加社會對報紙的需要。可是增加報紙讀者的根本動力，還是文化教育的進步。中國將來要立國於天地之間，非要加强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不可。教育普及，識字的人增加，報紙銷數自然也就普遍的增加了。這是顯而易見的。

現代報紙不只需要更多的讀者，還需要思想的讀者。自由的職業的報紙可以有很多的弊端，尤其企業化之後，甚至可以成為罪惡的媒介。關於這方面，我們在上邊已經約略的提到。十九世紀後半西洋各國的報紙對社會究竟利多於害還是害多於利，是值得辯論的問題。報紙本來只應以社會福利為目標，而現代報紙竟使人發生這個疑問，其責任當然要由社會經濟組織和報人共同負之，但與報紙讀者也非毫無關係。例如報紙迎合讀者的淺薄的感情的和不道德的心理，這必是因為讀者是淺薄的，感情的和不道德的，才給報紙以迎合的機會。有人說報紙是社會的產物；就原則講，這句話是要不得的，而實際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拿上海和北平比。上海一向是海盜海淫

的「不良小報」叢集之地，北平則不然。再拿美國的紐約同華盛頓比，美國的「黃色報紙」發榮滋長於紐約，而華盛頓則極少見。所以報紙的好壞，社會也要負一部分責任。一個國家讀報的人的量的多，自然勝於量的少。最要緊的還是讀者的質的提高。就是要有更多有思想的讀者。報紙讀者之質的提高，可以造成一種「輿論的輿論」。這種輿論，可以控制報紙，不使他向邪路走。美國是所謂「黃色報紙」的發祥地，在本世紀的前後四五十年間，這種報紙給社會造了許多孽。後來風氣日見澄清，邪道的報漸漸走上了正軌；主要的力量是美國多數的報紙讀者都能分辨什麼報要得，什麼報要不得。要不得的報就給他一個抵制，使他不能立足，或是使他不得不改邪歸正。前些年美國許多大學教授聯名發表宣言，呼籲抵制黃色報紙大王賀斯特。同時並有人大聲疾呼，揭發美國報紙的「十九罪狀」。這在當時雖然只收到了「道德的效力」；但是今日賀斯特系的報，比較美西戰爭時期的胡搞，其進步已不可以道里計。這多半是由於「輿論的輿論」制裁的力量。本來報紙同社會的關係，非比商品與購主那樣簡單。雙方互有權利和義務。有人說報紙是社會的「公共信託」，社會無形中對報紙負有指導的責任，制裁的義務。有思想的讀者，不允許報紙亂來。所以要報紙盡到牠應盡的職責，有思想的讀者對牠發揮力量也是要緊的。一國識字的人多，只能增加報紙讀者的量；只能使報紙銷的多。一國的文化學術水準高，不僅增加報紙讀者的量，還能提高報紙讀者的質。報紙讀者量的增加，不是理想；質量同時並增才是進步。

報紙讀者的質的提高，不但對報紙能發揮消極的制裁；還有積極督促報紙進步的力量。假使一個國家科學發達，多數人都受過科學的訓練；他們的態度比較客觀，他們有分析、分辨和判斷的能力；自然報紙的內容至少必須能經得起這種讀者的眼。報紙的言論，必須力求客觀，新聞必須力求正確。這種無形的「選擇」督促，對報紙進步有很大的關係。

此外，從作報的技術方面看，現代的報紙也需要有思想的讀者。報紙機械化以後，作報的技術也由簡單而複雜。新聞的範圍日廣，人類社會各種現象都將成為新聞記者採集的目標。從「盜竊」、「自殺」，一直到國際關係。假使報紙讀者沒有一點學術修養，沒有新聞之背景的知識，對於每天報紙所登載的，必將有一部分使他們感覺味同嚼蠟，甚至根本不知所云。而且新聞紀錄的方法，也不是以前那樣簡單。譬如，一段新聞電報的「電頭」，包括好幾件事，如：「柏林三日海洋社電」，「柏林」是指這段新聞所發來的地點，「三日」是發報的日期，「海洋社」是發這段新聞的機關。「柏林」是納粹德國的首都，「海洋社」是希特拉的喉舌。看到這兩個名詞，不用看新聞內容就可以大致斷定這段新聞一定是對德國有利的。假如另外一段新聞，報告同一件事，而「電頭」是「倫敦三日路透社電」，「倫敦」與「路透社」兩個名詞又指示給讀者這段新聞的另一個背景。同是報告一件事的兩個不同「電頭」的新聞，牠的內容常常不一樣。「電頭」裏的幾個字，對一段新聞的瞭解有很大的暗示。何去何從，那就要讀者自己去判斷了。自然讀者可以責備新聞編輯，為什麼不直接了當的把可靠的那段登出來，不可靠的不要登，豈不省了讀者很多的麻煩。不錯，新聞編輯有這個責任，可是有許多時候他自己也難判斷清楚。與其冒險，不如都登出來，叫讀者自己去選擇。新聞編輯這種態度並不是「滑頭」，因為這表示他沒有成見，他客

觀，他虛心；他不願意自認爲比讀者更聰明，而以他的腦筋代替了讀者的腦筋。這種作報的方法實在是進步的。像這類的問題非常多。報紙越進步，報紙讀者的責任也就越大。社會自然希望有好的報紙，報紙同時也希望有有思想的讀者。我們期待着將來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達，期待着有更多有思想的讀者，協助促進將來中國報紙的進步。

(四)

最後談到報人。假定上面的三個「假定」將來都能逐漸成爲事實；自然要加重報人的責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發展的機會越大，失敗的機會也越多。明日的中國報人怎樣去肩負這個千鈞重擔呢？講到此處，我願意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來喚起將來中國報人的注意。在現代一切職業之中，報業是最繁雜的，簡直可以說是「不可能的職業」。因爲許多別的職業都能有一個有限度的至善至美；報業沒有。永遠不會有。許多別的職業的從業者，可以有絕對的成功；報人只能有比較的，相對的成功。他的工作的結果，無論自己認爲如何滿意，別人譽爲如何優異；但總是有缺陷的。許多的缺陷。報人的主要工作是紀錄社會現象。報人是主體，社會現象是客體。主體和客體都有絕對不能克服的困難。我們先從主體說起。報人紀錄社會現象必須要正確；要紀錄正確，必須觀察正確。報人的觀察能正確嗎？據現代最時髦的實驗主義哲學家告訴我們說：「不能。」他們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因人受教育。就是說人能利用經驗。人若不受教育，便同貓，狗沒有什麼兩樣。他們把人的思想方式分爲三種：一是「白天作夢」，就是胡思亂想。二是「試驗與錯誤」，就是瞎碰。三是所謂「解決問題的思想」。人若不受教育，他的思想方式不出一二兩種。這兩種思想方式，也就是一切禽獸的思想方式，從蒼蠅到馬牛羊都優爲之。有的人所以能够高明一點，是因爲他們會運用第三種思想方式。可是這種思想方式要受知識的限制。必須知道的多；才有運用的能力。要知道多少才行呢？是「學富五車」，還是「八車」呢？據孔夫子的經驗，他說他活到七十歲就能够「從心所欲，不逾矩」。他學習了七十年，積蓄了七十年的經驗，用現代的話說，他的腦筋才清楚。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只有一個孔夫子。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孔夫子那個時代的社會，不能與現在的社會同日而語。假如他老先生生在今日，恐怕再加上三十年，也未必能够有那樣的自信力。何況渺小的我們！宇宙萬事萬物，人生數十寒暑；任你用盡了畢生之力，你能學習多少？知道多少？照實驗主義哲學家的說法，別的不說，報是不能辦的，報人是不能作的。

實驗主義把人看成不是個東西，這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相信「人爲萬物之靈」，相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來就有一面觀察萬事萬物的鏡子，一個衡量萬事萬物的尺子。人即使一個大字不識，或呱呱墮地，他比其他的動物高。可是不幸的很，人的這面原來明亮透關鏡子，都免不了落上許多所謂「思想的灰塵」。什麼七情六慾，偏見，感情，情性等等；再加上許多不能免的身體方面的缺陷；這面鏡子所反映出來的，絕對不易同原來的一樣一樣。因此，人的這個尺子，也就忽短忽長，不易準確。報人也是人，當然也

要受這個限制。

我們再分析客體的社會現象。這又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社會現象有幾個特徵：（一）牠是抽象的，虛無飄渺把握不住的。（二）牠是隨時在變的，一分一抄不停的在變。（三）牠是沒雙份的，一個是一個樣子；可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相似」，絕對沒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相同」。（四）牠是永不會重演的。一幕過去之後，永不會從頭再重演一次。（五）除了人頭上長着的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幫助人來控制牠。以那樣殘缺不全的主體，來對付這樣的一個客體，怎麼能够有把握？拿蒙着許多灰塵的那面鏡子，來照這樣一個神出鬼沒的東西，怎麼會照的清楚？此外再加上作報技術的，語言文字的種種困難；報人成天整夜的亂忙，結果頂多落個「差不多」，「大概齊」。錯誤比較少，已經是頂成功了。沒有「滿福滿壽」，不會「盡善盡美」。我說報紙根本就是不可能職業，其故在此。可是現代社會非牠不可。報人先生只好「勉為其難」。好在，盡善盡美的境界雖然可望而不可即，假如肯拚命努力，一定能够「雖不中不遂」。

怎麼樣去努力呢？

第一。心理方面。報人在心理方面應該積極的有所為，消極的有所不為。現代報業雖然沒有必須遵循的經典；但是報業是「思想的職業」，其使命是為增進公共福利；這已是鐵案如山，不容置疑的了。報人在積極方面應該把持着這個信念，應該以這個為永不動搖的努力的方向。報紙不一定要一個作法。從報紙內容說，甲報可以致力於文化教育，乙報可以致力於工商業，丙報可以致力於國內或國際政治，丁報可以致力於宗教慈善事業。諸如此類，均無不可。從作報的對象說，你可以辦一個報專以知識階級為對象，他可以辦一個報專以鄉村農民為對象，另外一個人也可以辦一個報專以婦女為對象。諸如此類，也均無不可。再從報人方面說，甲可以是自由主義者，乙可以是社會主義者，丙可以是宗教信徒。只要你忠實於你的原則，儘管把牠貫徹到報紙上。實在說，報人的異趣，報業的分化，毋寧是進步的現象。因為社會是多方面的，對報紙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千篇一律，互相摹倣；只是浪費。總而言之，報業是自由的職業，誰都有權辦報，報怎麼樣作都行；可是萬變不能離其宗，那就是公共福利。明日的中國報人，責任更加重大；必須在心理上有這樣的一個起碼的信念。

從消極方面講，報人應該有所不為。報人不應該拿報紙當作達到任何一種卑鄙的目的之手段。報紙企業化之後，自然不能完全不顧利潤；可是利潤不是辦報的主要目的。報人不是不得參加政治，可是不應以報紙為陞官之階。報人的社會地位，實至自然就會名歸；不應以報紙作為滿足自己虛榮心的工具。舉凡名也，利也，陞官也，發財也等等，都在報人有所不為的範圍之內。這種積極的和消極的心理，是互相為用的。假如不能有所不為，便不能有所為。反之，能有所為，才能有所不為。

第二，知識方面。我前面說過，「報業是不可能的職業。」尤其是到了現代，其「不可能性」越發大。現代的社會關係是非常錯綜

複雜的。社會現象的內含，更是經緯萬端；而報人工作的對象，其範圍又日趨廣漠。一個事件的發生，有縱的與橫的深遠的牽掣。有人諷刺現在的報紙，說報紙所登的新聞，不過是一棵樹露在地面上的那部分。更重要的是地面下的「根」；可是報人只知「枝」，「節」；而不明「根」，「本」。這個諷刺很可以提醒報人要在學識上注意。報人必須明瞭「根」，本，才能紀錄「枝」，「節」。一個報人對於現代的各種社會科學，以及歷史，文學等等，都必須有相當的修養；而且還要一時不停息的「作到老，學到老」。

第三，技術方面。在報業沒有企業化的時期，作報不需要甚麼專門的技術。企業化的報業，則非講究技術不可。例如怎樣運用環境，使你所採訪的新聞比較迅速正確；在一大堆新聞報告之中怎麼樣分辨並選擇裏面的真偽，虛實，權衡那個重要那個不重要；怎樣搜集材料，運用學識，討論當前的問題。報紙企業化之後，作報必須講效率，必須求迅速。報人的工作要和機器同樣的加速度向前跑。企業化以後的報紙，要編製的美觀。報人作報的「手藝」要和機器同樣精緻。此外如業務的經營，人事的管理，銷路的推廣，廣告的設計，都成了專門的技術了。作報所以成爲一種科學，所以要在大學之內分門別類的施教，是現代報業自然的要求。

以上三點，是明日的中國報人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認清報紙對社會關係的重大與密切；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報紙真有這種力量。對於這樣嚴肅的「思想的職業」，不是可以兒戲的！明日的中國報紙對國家社會是禍是福，十九繫於，國的報人身上。快要黎明了！我們期待着明日的中國報紙躍入光明的新時代！

報紙與罪惡新聞

(10)

錄自北平中大學報第三卷第一二合期

現代報紙雖然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可是它依然還是一個無拘無束的天之驕子。在所有所謂「自由職業」之中，它可以說是最自由的。原因是，現代報紙發榮滋長於西洋工業改革同法國大革命之後，它是近代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產兒。十九世紀中葉的丹納（C.A. Donna）曾慨乎言之曰：「據我所知，報人還沒有共同遵守的職業的規則」。差不多一百年後的岳斯特（C.S. Yost）仍然抱有同感。就是現在的我們，也還找不到一部「報業經典」。一般的所謂報學原理，也不過是見仁見智的個人的意見；而「報紙道德規律」（Code of Ethics）之流，頂多祇能代表極少數人的意見，而且是絕對沒有強制力的。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自然是上面所說的現代報紙誕生的歷史環境；而報業內部組織的複雜也不無關係。或者也可以說，後者是前者之果。報業一方面是所謂「思想的職業」：舉凡新聞的採集，編輯以及言論的發表，完全是屬於思想的工作。思想的工作應該是超然物外的；報人的立場，應該同宗教家，慈善家，或學者相同。他應該拋棄物質，遠離紅塵，他的思想才能正確，他才能盡他的使命。可是現代報業需要大量的資本，牠應該具備的物質條件，不減於任何其他「企業」。前幾年美國的一個中級報實城檢閱報出盤，成交價格是壹仟伍佰萬美國。芝加哥講壇報，祇印刷機器一項，就佔用資本一百五十萬美國。這種情形，並不限於美國，所有現世資本主義國家莫不皆然。企業化的結果，當然定利潤的謀求。因此，辦報同開銀行，幹商店，並沒有兩樣。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報紙按照普通公司的組織，報紙的股票，在證券市場上的地位，同其他股票完全相同。美國人普通稱報紙為「報紙實業」（Newspaper Business），或「報紙工業」（Newspaper Industry）。近來，甚至把報業列在所謂「大買賣」（Big Business）之林。就是這個道理。就報紙的內容說，牠應該是非物質的；但從牠的組織看，又是極端物質的。作和尙容易，作飯館子的老闆也不難；既要脫離紅塵，又要生財致富，那就不好辦了。現代報業的組織，是兩個形同水火，根本衝突的元素合在一起，所以牠的身分便難分明。站在非物質的立場，看一個問題，是一個樣子；站在絕對物質的立場，看一個問題，又另是一個樣子。現代報紙的許多政策問題，大半是因為這種的矛盾，而陷報人於無所適從的苦境。罪惡新聞如何處置的聚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罪惡問題，可以說同人類社會的歷史一樣悠久；而且是不分文野，只要群居便有這個問題的存在。近代犯罪學家研究罪惡的起源和演變，甚至說：凡是哺乳動物同鳥，以及脊椎和非脊椎動物，都有與人類社會的犯罪與懲罰相似的事實。例如蜜蜂，螞蟥，過着團體的生活，對於採集食物而不能盡職的，就認為是「犯罪」，而且要受「懲罰」。鳥類中如知岩燕，食鵲，麻雀等，有近乎法庭審判的舉動

。再高一點的動物，如人猿，牠們營着家庭生活，一雌一雄，互相配偶，儼如人類的一夫一妻；凡實行亂交的，同類便羣起而攻之。據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的解釋，凡是營着團體生活的動物，都有「社會本能」和「社會感覺」；因此便有共同的習慣，違反共同習慣的行為，便是犯罪。人類是哺乳動物之一，所以在原始時代就具備哺乳動物的特性，即「社會本能」和「社會感覺」。例如惱怒，同情，性的衝動，父母子女之愛等；這都是群居的結果，也是群居的動力。以個人說，是習慣；就團體說，是風俗。此外，人類還有比其動物更高的地方，就是人類有語言文字，這更提高了他們的社會生活。因為借語言文字的力量，人類社會表現了輿論同倫理觀念。因此人類的行為，便有更多的束縛；觸犯這種束縛的行為，便是犯罪。有人研究原人社會的犯罪，有以下幾種：巫術，亂倫，叛逆，瀆聖，毒害，破壞狩獵的規則。文化比較進步的人類社會，情形更加複雜。就罪惡的數量說，絕不會少於原始社會；就罪惡的性質說，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宗教家認為現世是「涕泗之谷」，幸福是在來世，固無論矣。就歷史家也承認，人類的歷史，「差不多是罪惡的紀錄」。我們假如能够把現代的所謂文明，分成物質的與精神的，物質的文明實不啻罪惡的淵藪；而所謂精神文明，不過是防止或減少罪惡的方法而已。比如中國儒家哲學裏面的「禮」。什麼是「禮」？大戴禮記禮察篇說：「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渺，使民日徙善遠惡而不自知也。」這是儒家思想精華所在，而其對象，也無非是在解決罪惡問題。此外墨，道，法各家，持說雖異，目的則一。近代西洋的文物制度，以及社會科學，哲學，教育學，倫理學，法學等等的研究；一言以蔽之，還不是積極的要增加人類的幸福，消極的要防止和消滅罪惡麼？所以罪惡是人類社會的中心問題，也是人類無時不在謀求解決而尚未得解決的問題。

報紙對於社會的罪惡的事實，應該採取什麼政策呢？大別言之，不外三種：

第一正面的，就是主張報紙對於社會的罪惡，應該無限制的揭載。這個政策，可以說同現代報紙同時產生的。十九世紀後半以來，我們常聽說的所謂「黃色新聞」或「刺激主義」，就是這個政策造成的。那個時候，正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炙手可熱的時期，辦報的人，把報紙看成貨物，銷數多多益善；推廣銷路最好的方法，無過於使新聞富有刺激性。而最有刺激性的新聞，是反常的或變態的新聞。所以有人解釋新聞價值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前者是常態，後者是變態。罪惡新聞是變態的事實的紀錄，所以是新聞的上品。這是從新聞價值方面說。此外，從報紙功用方面看，也有很動聽的理由。報紙反映人生的，人生有美也，醜，有善也，有惡。報紙最主要的任務，是忠實的紀錄人生；人生的美的善的方面，自然要紀錄，醜的惡的方面也一樣的一樣不可忽略。報紙是「人生反映在紙墨之上」。罪惡新聞，是人生醜的方面的事實，所以也同樣要刊載。「黃色報紙」大師但納有一句名言，他說：「凡是上帝允許發生的事實，我們都應該紀錄。」這是個政策最有力的註腳。

進一步，從社會的福利方面設想，罪惡新聞也有應該無限制揭載的理由。罪惡既是社會的一個中心問題，又是人類無時不在設法謀

求解決的問題；當然應該先對於牠的本身有清楚的認識。諸如罪惡的性質、範圍，與夫構成的因素，都必須先有正確的概念，然後才能有消滅和挽救的方法。而且社會改進，如能有一般人協力，收效乃能迅速。要得一般人的援助，勢非先造成輿論不可。造成輿論最好的方法，是先揭布事態的真相。所以，爲了社會的進步，也必須無限制的揭載罪惡新聞。西諺有云：「光明是最有威力的警察」。罪惡越是在黑暗之中，發育滋長越加厲害；如果把牠擺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得見，牠便如微菌一樣，很容易自然滅亡。隱蔽社會罪惡，無異於助長罪惡的蔓延。有人以爲罪惡的揭載，會使人學習犯罪，其情有如揚湯止沸；因爲人天生有一種好奇的本能，尤其對於罪惡的事實，這根本能最爲強烈。人如常常接觸罪惡，耳濡目染，自然不免於模倣；因此，報紙無限制的揭載罪惡新聞，實等於傳播罪惡。駁之者曰：也不盡然。人對於罪惡的事實感覺興趣，不見得就是錯誤。人不是有很多有益於他自己的本能嗎？據心理學家說：「人的活動的部份，包括許多強有力的本能。有的是溫和而繼續，有的強烈而短促。有的卑鄙，有的高貴。都是必需的。」人如能善用其本能，本能永不會加害於人。只是因爲誤用；牠才對人有害。人對於罪惡有興趣，這也可以說是人的一種自衛的本能。因爲有興趣，所以才認識的更清楚；更能明瞭罪惡的醜態以及牠的錯誤和危險；而且隨時有防範的準備。這樣，對於罪惡好奇心的本能，不是對人有益的嗎？又有入以爲這個問題即使對成年的人不甚嚴重，可是對青年則很危險；因爲青年意志薄弱，而模倣力強。駁之者又曰：這也是淺見。假如社會充滿了罪惡，青年人在未入社會之先，更應該對於罪惡加以認識，否則等他人入社會之後，將如身入五里霧中，不祇無所適從，且有墮入深淵，不能自拔的危險。如果他對罪惡已不陌生，將來自然可以應付裕如，不爲所害。所以報紙無限制的揭載罪惡新聞，不祇對於社會沒有害處，反而有利。新聞記者發掘社會的罪惡，勿寧說是他的職責。自古以來，詩歌，小說，戲劇，許許多多是罪惡的描寫；而且在文學史上有地位的作品，又多是描寫罪惡的技術最高的作品。不祇文學，就是基督教的聖經，從頭至尾，不知紀錄着多少罪惡。文藝作品以至聖經紀錄人類的罪惡既然無害於社會，何以報紙揭載罪惡便會有壞的結果呢？

以上是主張報紙應該無限制的揭載社會罪惡的主要理由。

第二，反面的看法，主張報紙絕對不應該刊登罪惡新聞。其理由分爲兩類：一，報紙刊載罪惡新聞所產生的普遍的惡影響。(甲)傷風敗俗。據心理學家說，人的思想與行爲，很容易受「暗示」和「模倣」的影響。對於個人，罪惡新聞「足以構成一種行爲的邊緣的一部份，或是一種行爲的核心；這個邊緣的部份或是核心，常常會引導一個人去犯罪。」換言之：「我們的行爲，就等於我們是什麼；我們是什麼呢？我們的大部份，是我們所常想的。」假如我們常想罪惡，行爲也就不知不覺成爲罪惡的行爲。一般的人，是經不起「暗示」與「模倣」的力量的。不只青年如此，成年的人也是一樣。至於對於整個社會，報紙的讀者，無異於一個群眾。據心理學家研究的結果，羣衆是缺乏理性的；羣衆不會分析，不會衡量，不會比較；而最危險的，是羣衆不知道怎麼樣利用他平日所得的教訓去指導他的行爲。個人到了羣衆的中間，會完全失去他個人的入格。報紙的讀者，無異於一個演說家面前的聽衆，他們是很容易被作弄的。根據這

種羣衆心理的分析，報紙刊載罪惡新聞就等於領導整個社會向着傷風敗俗之途邁進。美國一向反對刊登罪惡新聞的報基督教科學訓練者（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主筆亞包特（W.J. Abbot）說：「有人以爲報紙刊登罪惡新聞是報紙對社會的一種貢獻；我真不知他們何所據而云然。不過，報紙在一個城市裏面有系統的刊登罪惡新聞，其結果是，在這個城市裏，與報紙記載相同的罪惡的增多，是鐵一般的事實。」假如讀罪惡的小說會敗壞一個人或一個社會的道德，讀罪惡的事實所產生的惡影響，可以不言而喻了。這種情形，不僅心理學家已經有科學的研究，證明是千真萬確的；法院的法官以及大都市的警察機關，都很容易容提出許多例證來。（乙）使法律失掉尊嚴。現代人類社會的安寧秩序，大半要靠法律的威力來維繫。而法律的威力，則又常常仰仗人民對牠的尊重。報紙刊載罪惡新聞，就等於連篇累牘的記錄社會的違法事件。這一方面是鼓勵犯罪，同時使社會造成一種輕視法律的心理。犯罪既然不足爲奇，則人心目中視法律如廢紙。法律失去了人們的尊重，就等於失去了牠的尊嚴；結果法律便沒有維繫社會安寧秩序的力量。（丙）隱惡揚善，對於社會的進步，常常有很好的影響。社會裏人人發掘別人的美的方面，善的方面；無異於鼓勵人向美善方面發展。社會生活最需要的是同情，是互信，是彼此揚人之善。「充滿了這種精神的社會，才能有更公平的法律，更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更繁榮而和平的共同生活」。報紙無限制的揭載罪惡新聞，會使人人互相猜嫉，互相鄙視，互相防範；結果使社會生活更趨下流，整個社會更加黑暗。（丁）最後，報紙揭載社會的罪惡，會使熱心於社會進步的人因而灰心。每天讀報，所見無非是罪惡；眼前一片黑，即使欲努力於社會的改善，也會發生悲觀的心情，覺得事實如此，欲求改善，有如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難，遂不免由悲觀而失望，以至於絕望。以上是報紙揭載罪惡新聞可能發生的壞影響；也就是反對報紙登載罪惡新聞的一部份的理由。

此外，報紙刊載罪惡新聞，還有特殊的惡影響。（甲）示人以犯罪的方法。報紙刊載罪惡新聞，常常繪影繪聲，不厭求詳，讀者往往可以從新聞中得到犯罪的方法。有時新聞內所包含的犯罪方法，雖然不很明顯，但是也會給讀者一種暗示，將來遇到適宜的環境，這種暗示就會發生作用。前者不一定很常見，後者則屢見不鮮。前些年，美國喬治亞（Georgia）地方，有一個年青的銀行書記，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悲觀厭世，蓄意自殺。於是服了多量的二氯化汞。這種毒品，服下去之後，一定死；可是要經過四五天，毒性才發作。他吞服之後，發出了很多的請柬，請他的親戚朋友到他家裏，舉行一個盛大的筵會，然後從容死去。這是一個很寫意的自殺，因此報紙便詳細的把這件事發表出來。事後調查，在這個自殺發生之後的幾個星期內，服二氯化汞自殺的，全國各地發生許多起。這無疑是報紙宣傳的結果。在美國，類似這種的事例，不勝枚舉；如「毒針案」，「探戈暗殺案」，均曾轟動一時。（乙）使犯罪的人失去自新的機會。人都知愛惜名譽，即是犯了罪的人，也不願意別人知道。人都知道犯罪不是好事，假如能够自新，也都願意自新。這是普通一般人的心理。報紙對於罪惡事實，盡力搜索，但求合聲托出，毫不爲犯罪的人設想。甚至添枝加葉，肆意刻畫。發表之後，無異宣告犯罪人的名譽的死刑。其以犯罪爲職業，絕無改悔之心者，報紙口誅筆伐，尙屬情有可原。假使不得已而犯罪，或根本就是傳聞失實，而報

紙冒然揭布，事後欲加挽回，事實已不可能。結果，將使本有自新之志者，以為醜態既已四播，悔改又復何用？素性再變再厲，日趨下流。至於因傳聞失實而含冤者，報紙刊載之後，其名譽地位之損失，有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者；也許因此悲觀厭世，也許本是好人，由此一變而為非作歹，均不無可能。（丙）使人獸性化。報紙刊登之罪惡新聞，常常致力於殘忍的事實之描寫，惟恐不使讀者驚心動魄，毛骨悚然。與此種事實接觸，無異身入恐怖之鄉，日積月累，視若尋常，人心由此會變成獸心。梁任公談變法維新嘗引說部的故事。他說：「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梳而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為。乃各摘其頭，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這段話，正可以說明這種罪惡新聞所予讀者的影響。（丁）影響司法獨立。在法治國家裏，一個人未經法院判決他有罪，沒有人能說他有罪。報紙刊登罪惡新聞，有時儼如法官，在法院審判以前，即已肯定指明，當事人的罪狀與應得的懲罰。有的全憑主觀，濫發意見，無形中造成一種輿論，使法官的判斷為其所左右。民國三十年北平發生的郭華氏一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外國，這種事實更多。

以上是反對報紙刊登罪惡新聞的理由。

第三種態度是折衷的。報紙既不應該無限制的掲載罪惡新聞，也不應該把罪惡新聞一概抹殺，應該加以選擇。選擇以什麼為標準呢？以社會公共的福利作標準。岳斯特說：「報紙登載罪惡新聞，應該以揭布罪惡的醜態及其危險為目的，以使社會知所警戒與防範。這樣作，才是對社會真正的和必需的貢獻。報紙負着一種辨別的责任；辨別什麼是貢獻，什麼不是，什麼是真正的新聞價值，什麼只是卑鄙的好奇心的反應。總而言之，要能分辨什麼宜於發表，什麼不宜於發表。完全不登罪惡新聞，報紙自然不能算盡了他的職務；可是也不能不顧純潔與公正，而『矢尿並載』」。在每天的罪惡新聞之內，報紙應該選擇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在一段罪惡新聞之內，應將所有誹謗誣淫的事實一概刪去。同時更要使新聞裏面所含的破壞性，變為建設性。譬如，一段自殺的新聞，除了將何人何地何時如何等事實敘述清楚外，更應該在「何故？」一點上多加注意，使讀者與社會明瞭自殺的原因，從而知所防範與救濟。這種新聞便含有建設性，對社會便是一種貢獻。

以上三種主張，兩個是極端，一個是中道。第一個極端的主張，至少在報紙最發達，同時這個問題也是最嚴重的美國，已經消沉下去了。彈此調的人，現時已不多見，這是現代報紙經過一個世紀的演變，比較進步的現象；也是法律同社會對報紙的輿論發揮力量的結果。第二個極端，只是極少數以宗教為背景的報尚在墨守。現時一般的報人和社會知識份子，至少在原則上，都服膺折衷的主張；雖然這個主張尚未能成為有拘束力的報學經典或法規。假如報人同社會對這個問題都能有正確的認識和努力，這對於人類社會公共福祉的增進，也許不無小補。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於北平）